

部》：“迁，谪也。”《书·皋陶谟》：“何忧乎欢兜，何迁乎有苗。”伪孔《传》：“有苗、欢兜之徒，甚佞如此，尧畏其乱政，故迁放之。”蔡沈《集传》：“迁，窜。”

③黄侃《广雅疏证笺识》，见《量守庐群书笺识》，武汉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版。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大学中文系

也释“述往事，思来者”

彭忠德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有一段借古人行事以明志的文字。其辞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圜圜。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按上述标点理解，这段文字至少有三层意思：一、西伯、孔子等人陷于困境，发愤著书立说；二、他们著书的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三、司马迁以西伯、孔子等人自况，发愤写作《史记》。本文重点讨论“述往事，思来者”。

当代一些史学家援引此六字时，多释作“记述历史，思考未

来”，或“记述历史，观察未来”。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不对，应释作“记述历史，使将来之人思考”。其理由如下：

第一、“来者”谓“将来之人”。

“思来者”之“者”是一特殊指示代词，与动词联用，组成名词性的词组，表示“……之人”。此处“来者”、联用，即指“将来之人”而非“未来”。《史记》中含有“来者”的句子颇多，诸如“来者来”、“来者环至”、“来者皆欲有言”、“彼来者为谁”等等，皆指人。其他古籍亦是如此：先秦典籍《论语》中有“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汉代著名史家荀悦《汉纪》中有“撰《汉纪》百篇以综往事，庶几来者亦有监乎此！”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中有：“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史通·曲笔》），“足以开后进之蒙蔽，广来者之耳目”（《史通·杂说中·北齐诸史》）。

又按古籍中，“来”作“未来”解，其后并不加“者”，如《周易·系辞下》：“彰往而察来”；《汉书·京房传》：“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等皆是。

第二、“思”谓“使……思考”。

古代汉语中，有些词可以按照人们约定的语言习惯灵活运用，临时改变它的语法功能。其中较为常见的有活用为“使动用法”。前引《太史公自序》中“思来者”之“思”，即是及物动词用如使动，其义为“使……思考”而不是原义之“思考”。由中古代汉语中兼语式用法极为罕见，这其实是用动宾结构表达兼语式的内容，即“思来者”表示“使来者思”。古籍中不乏其例：先秦之例，如“晋侯饮赵盾酒”之“饮”（《左传·宣公二年》），两汉之例，如“朝诸侯王于甘泉宫”之“朝”（《汉书·武帝纪》）。

古代文史大家均持上述见解。《汉书·司马迁传》中，司马

迁报任安书也有前引《太史公自序》文字，颜师古即释“思来者”为：“令将来之人见己志也。”可见他也认为“思”用如使动，“来者”是“将来之人”（《汉书》颜注）。大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曾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6）此处“来者”指后来之人，史之“述往为来者师”，亦即使“后人”“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几乎是重复太史公之语！又，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有一段名言是：“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文史通义·书教下》）。其中，“来”指“未来”，“来者”指“将来之人”，区别十分清楚。同时，他也强调了“撰述”的目的是“欲来者之兴起”。这与“记述往事，使将来之人思考”意思相近。

在明确第一、二两个理由后，再就“此人皆意有所郁结……自黄帝始”两句句法结构看，“思来者”释作“使将来之人思考”，则“述——往事”与“思——来者”都是动宾结构，句子显得工整而流畅；如释作“思考未来”，则“者”字既不宜属上，又与下无缘，当非太史公笔意。

第三、司马迁亦欲“令将来之人见己志”。

从前引《太史公自序》全文看，“述往事，思来者”之主动者指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臆、吕不韦、韩非及《诗》作者，就其著作而论，并无“思考未来”的内容。唯其如此，颜师古才认为西伯等人著书目的是“令将来之人见己志”。

笔者以为：司马迁于此列述诸贤行事，实有表明自己胸臆——“述往事”以“令将来之人见己志”之心。李陵败降之事传入汉廷之后，“主上（汉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司马迁说：“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适会召问……

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二师（按二师指汉武帝宠姬之兄），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结果“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他认为自己“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汉书·司马迁传》）。这种经历、心情，足以说明司马迁也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但他没有消沉，而是“既陷极刑，幽而发愤”（同上）。在指出西伯、孔子等人“皆意有所郁结……思来者”之后，他立即说自己“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明显表明他是在师法西伯、孔子等贤圣之行事，发愤著书立说，“以令将来之人见己志。”

又，司马迁从未表示过写《史记》的目的是“思考未来”，只是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又欲何为？他说：“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太史公自序》）原来也是要为后世圣人君子留下信史。“俟后世圣人君子”语出《春秋公羊传》，原谓孔子“制《春秋》，以俟后圣君子，亦有乐于此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据此，司马迁确实是要师法孔子之行事，“令将来之人见己志”。

司马迁曾多次申明自己写史是要留下供后人思考的历史，《史记》中即有五次这样意思的“太史公曰”。请看其中两次：“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六国年表》）；“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另三次见《孝武本纪》、《十二诸

侯年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文繁而不具引。这些皆足可证成“使将来之人思考”是，而“思考未来”非。

以上所释，当无大误。兹略申其“小题大做”之意。本文之所以咬文嚼字，刻意辩明这个问题，是因为“记述历史，思考未来”与“记述历史，使将来之人思考”的意境有高低之分。前者历史视野深远，大有神驰过去、现在、未来之意，其抱负、其史识一何雄健！后者严守史家职责，要为后人留下历史反思的信史，其史责（史家责任感）亦动人于千秋万代之后。虽然二者同样难能可贵，愚见以为前者的思想境界及在史学史上的意义，要高于后者。二者区别清楚之后，一方面可以有助于恰于其份地评价司马迁，不因爱重而增其美；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弄清楚中国史学史上究竟是何时何人首先提出依据历史与现实去预测、思考未来的观点，从而准确地把握我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兹事体大，本文不足论列，仅以“一得”助贤者思，末学则乐观其成，欢呼传述于后。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大学历史系

曹炽卒年考

李炳震

曹炽是曹操的从弟曹仁、曹纯之父，史无传，其仕历略见于陈寿《三国志》裴注及《水经注》。近年来曹操故里安徽亳县曹氏宗族墓的发掘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展开了讨论。在曹氏宗族墓清理出的一百余方有字墓砖中，有关曹炽的字砖凡两方。考证